

试论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

夏维奇

(淮南师范学院 政法系,安徽 淮南 232001;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要] 从19世纪70年代起,晚清重要洋务企业家与早期维新理论家郑观应,开始关注西方近代重要通信工具——电报的社会价值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并自80年代后广泛参与了晚清的电报建设。考察郑观应在晚清电报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活动的同时,探讨其在此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可从这一个案领域揭出晚清社会在向近代转型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关键词] 郑观应;晚清;电报业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30(2008)02-0015-05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5月24日,美国人莫尔斯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自此,电报作为近代科技的重要产物正式宣告诞生,对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880年(光绪六年)9月16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天津至上海)电报线,掀起了晚清大规模自建电报活动,由此而全面开启中国通信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在此重大历程中,郑观应(1842—1921年)可谓是一位较为特殊的角色,他既是一理论家,著有《论电报》等文章,在晚清朝野产生重要影响;又是一实践者,曾积极参与晚清三大电报干线的建设,并一度出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中国电报局总董等职,对晚清电报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考察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认清郑观应在中国近代通信发展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而且还可从一个案领域揭出晚清社会在向近代转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论电报》及其影响

19世纪60年代初起,西人已屡屡向清朝政府提出在中国架设电报电线,遭到大清官员的坚决抵制。须指出的是,清廷内外不但一概拒绝西人的请设,自己也不积极主动引进这一西洋科技。其中原因固然涉及多面,然最为重要的当是时人对之认知的有限,认为不过是“奇技淫巧”,非关治国大道。如两广总督瑞麟等曾称:“至于工织器具、寄信电机(时人对电报机的另一称谓)不过技艺之末,

无关治道。”^{[1]65}更有部分人士甚至盲目认为“铜线(时人对电报的又一称谓)铁路二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2]18}。这种状况至70年代后稍有改观,国人吁请自设电报之声已零星出现,但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其重大弱点在于缺乏深入的理论论证,故是时反对之音仍不绝于朝野。例如1875年(光绪元年)9月30日,工科给事中陈彝折片指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谨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事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3]330-331}陈之论堪称是此时期保守势力对电报这一新事物态度的代表。

然就在此间,上海洋行买办郑观应开始创作《易言》一书,并于1875年前后完稿,至迟在70年代末传阅坊间。书中《论电报》(以下简称郑《论》)一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

郑观应指出:“夫世之至神至速,倏去倏来者,盖莫如电。藉电以传信,则其捷也可知。……今泰西各邦皆设电报,无论隔山阻海,顷刻通音,诚后古今未有之奇,泄造化莫名之秘。”郑在此较为准确地揭示出电报这一西洋新兴科技的性能与特

征。在郑观应看来,电报这一快速传递信息的功能,使其至少具有以下两大社会应用价值:其一是军事应用价值。郑观应说,“诚以两国构衅,赖电报以传递军机,则有者多胜,而无者多败。若两国交战,出奇制胜,则电报更为要图。昔年普、法构兵,普人于行军之处俱设电线,而法人所设之电线悉为普人所毁。是以法败而普胜也。”其二是经济应用价值。郑指出:“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即以英国而论,其电报设于王家,商民欲通电报者收回工费。每年所入,除电线局开销,余资藉充国用。至本国有军机密事,分文不费。其利岂不溥哉?”^{[11]82}可见,与保守思想对电报认知迥异的是,郑观应并不认为电报是所谓的“奇技淫巧”,而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通信工具,于军事于经济、于国于民皆有重大价值。既然如此,中国当不应抵制这一科技。

郑观应并未就此止论,他进而认为:“夫中国建都北方,至极南之地相距万里,其他多距数千里。燃烽置戍,仅能告警而弗克通言;设卒传号,辗转间关而多舛误。即令沿海要害,有炮台而无战船,则炮台亦孤立无徒,有战船而无电线,则战船亦应援莫及。若敌人侦知我战船之所在,合兵围击,无电线以通传,各省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费固不貲,而各处又为之夺气。”^{[11]82}据此,郑观应明确提出:“查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线,通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闽、浙、粤东,凡属海疆悉敕下大吏,揆度地势,次第举行,则宸居虽遥,俨如咫尺矣。”又说:“夫轮船、枪炮等物,中国用之有年,损益犹为参半,至电报则有益无损矣。何不举而试之哉!”^{[11]83}郑在此发出了中国自建电报的强烈吁请。

据上可知,郑并非只是简单地发出吁请,而是让该吁请建立在其对电报这一西方新兴技术的科学认知及对中国当下形势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与巨大的震撼力,从而在朝野产生了重要影响。1879年(光绪五年),道员王之春著成《清朝柔远记》,该书卷十九《蠡测厄言·精艺术》指出:“查津沽为近畿水道门户,宜先设一电线,由是而吴、而浙、而闽、而粤,凡属海疆及西北近边诸要隘,次第举行,无事以便商贾,其利犹小,至事关紧急,乃见奇功。”^{[11]372}王此论,受郑之影响颇为明显。19世纪80年代初,著名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刊刻《弢园文录外编》,其中《设电线》一文指出,“夫沿海险隘,有炮台而无战船,则炮台亦成钝物;有战船而无电线,则战船亦属玩器。何则?中国海疆辽阔,各省险要之区,即分兵驻守,而每苦于势分而力薄。若与敌国构衅,彼得窥探我之虚实,猝来攻击,所恃者有战船以往来游奕(弋),分途救护耳。然购造一战船,动费十数万金,各省只可筹设三五艘,藉资防守,又必分泊各处,期重其厄塞,壮其声势。若是则敌人何难侦知我船舶在何

处,潜约其船,猝出不意,合而攻我。苟无电线以报警,则各省无由得知,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所费不貲,而各处为之夺气,此则事之最可危者也。”又说,“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报,通于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浙、闽,由是而粤东,凡属海疆重地,莫不建设周密,四通八达,无远弗届,务期消息瞬息可通。架设电线,以畅通消息不可。”^{[16]62-63}同样可清楚看到郑《论》之影子。

最为关键的是郑《论》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影响。早在1865年(同治四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即有中国将来应建电报的设想。^{[7]8-9}70年代后,已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更是不断地明确将之提出,且认为已是当务之急。^{[8]269-270}但是时李仍只是一些直接地吁请,一直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阐理。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向清廷递呈《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以下简称李《片》),^{[9]16-17}由此全面开启晚清通信近代化历程。在该《片》中,李较为透彻地说明了中国架设津沪电报线的必要性。然仔细比较李《片》与郑《论》,我们会有微妙的发现。郑《论》写到:“前者,传报电信犹用外国字样,必待翻译而知;今辑有电报新书,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即经理电线者尚且不知,何况他人?既无漏泄之虞,又无延搁之弊。”而李《片》有这样的句子:“从前,传递电信循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二者表述如出一辙。此外还有:如前所引,郑《论》开篇是说:“今泰西各邦皆设电报,无论隔山阻海,顷刻通音。”李《片》开篇亦云:“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皆是说明西洋国度电报建设情况,且语言文字极为相近。不过,与郑《论》所提出的敷设津沪海线不同的是,李《片》请设津沪旱线。他说,“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蚀坏。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但这恰恰又体现了郑《论》所提出的“安设电报之处,在海底则难,其价颇重;在地面较易,其价亦轻”的观点。可以说,李奏设津沪旱线是对郑的上述理念的综合运用。根据这一切,我们认为,郑《论》当是李《片》的重要蓝本。

需指出的是,郑《论》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度地影响李《片》,是有其现实基础的。1878年(光绪四年),郑观应正与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在上海同办赋务,其时已为李鸿章所赏识。郑亦于是年进入李的幕府,^{[10]4194}成为李办理洋务的重要干员。在这一情形下,郑《论》为李所关注与参考,当在情理之中。

二、积极参与晚清电报三大干线建设

早自 19 世纪 70 年代中叶以后，晚清一些封疆大吏即在福建、台湾、直隶等处试建电报。但因当时中国风气未开，且由于所建电报线路短近，故影响甚是有限。据前已知，1880 年李鸿章奏设津沪线，次年该线建成，当年 12 月 28 日正式收费开报，^{[7]294} 中国大规模自建电报活动由此发轫。1883 年 1 月，李鸿章又奏设沪浙闽粤线（后以苏州为起点，架至广州）。^{[7]432} 同年 7 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再奏设长江线（自镇江沿长江而达汉口）。^{[7]732} 上两线约于 1884 年（光绪十年）夏间完工。至此，中国的电报大抵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中部沿江而建成三大干线，构建出晚清电报发展的主体骨架，后来其他地区电报的架设，基本是在该三大干线基础上的展延，可见该三大干线在晚清电报发展史上的地位，而郑观应则是全面参与了该三大干线的建设。

（一）津沪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1880 年 9 月 18 日，即李鸿章奏设津沪线的第三日，清廷准李之奏。^{[11]715} 李鸿章当即遴派盛宣怀等操办具体事宜。盛随即致函郑观应，请其参与津沪电线的建设，认为“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的郑遂爽快应允。^{[12]998} 自此，郑观应对于晚清电报活动由幕后的呼喊而开始走向台前的实践。1881 年（光绪七年）5 月 20 日，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12]998-999}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津沪线架设，“以天津为总局（大沽局附入），上海副之，苏州、镇江、清江、济宁、临清五处为分局”^{[12]1008}。而上海之所以能“副之”，是由于“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且有转运物料、联络洋人等事，头绪纷繁”。^{[12]1000} 故李鸿章的这一札委足反映出其对郑观应的信任与器重。

根据李鸿章奏案，津沪电报线先由官款垫造，待建成后再招商承办。^{[9]17} 就在该线工竣并将开报之际，盛宣怀拟定《电报局招商章程》^{[13]141-143}（以下简称《章程》），开篇即云：

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前蒙北洋大臣阁爵督宪李奏明，先以军饷项下垫办，俟办有成效，招商集股，分年缴本，即由官督商办，是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接下来是招商规章，共十二条，其中前五条主要内容为：津沪电报线架设，官垫经费二十万两，拟集商股十万两，归还一半官款。嗣后该线成本，官商各居其半，但官本在十年之内不提官利，以示体恤，保证在商本提取官利（长年一分）的情形下，仍易获利（作为公积）而推广线道。十年之后，官本与商本一律起息，但不提取，以添加官本。第六条规定，电局应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公务电信”（即头等官报）永不收费的方式报效官方。后六条言及一般电报收费标准、电局帐目管理、电报寄递

方式等项。

拟就《章程》后，盛宣怀遂南下与郑观应商讨。郑阅后，表示“当与盛道广访众论，复加参订，俟拟定后，当即禀候裁裁”。^{[12]1022} 郑此言表明，他已有对《章程》不尽赞同而欲修改之意。讨论中，郑观应并不反对《章程》第六条有关电局报效之规定，而是认为，“第一条至第五条所载以上所论各节，及‘官督商办是商受其利，官操其权’等语，似皆有流弊。”^{[12]1003-1004} 主要在于，《章程》过多地宣扬了官方对电报股商的体恤。郑说：“想执笔拟章程者意重利商，求易于招股，未曾深思远虑耳。”^{[12]1004}

那么，郑观应缘何反对《章程》的上述意旨呢？这是由于郑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认识。他说，“盖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家他日借口。”而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下，各股东无如之何！”^{[12]1003-1004} 从这里可看出，郑的反对旨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不宜过多宣扬官的体恤，以尽量减少其将来可能用以勒索的借口。应该说，郑的这一顾虑并非多余，晚清电报事业后来的发展情形已超出其预设范围。

郑的上述意见得到了其他电报委员的认同与支持，遂于《章程》“未妥之句，另纸贴说管见”^{[12]1003}。笔者未能找到郑的这一另帖。不过，从盛宣怀接下来所拟定的《电报局变通章程》（以下简称《变通》）中大抵还是可以窥见郑之“管见”的基本要领。《变通》对《章程》的第一至第五条主要内容修改如下：

（津沪线）现在全工告竣，共支用湘平银十六万数千两。众商拟先招商股缴还银六万两，五年后分年缴还二万两，按年缴五千两，免其计息；其余八万数千两，存俟头等官报抵给报费。

俟将此项抵缴完毕，别无应还官款，则前项官报，亦毋庸领资，以尽商家报效之忧。^{[14]208-209}

这当是一重大且又精妙的修改，因为与《章程》相比，不仅是一些数字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在于：二者虽皆坚持电局应以头等官报永不收费的方式报效官方，但若按《章程》的规定，确实存在“官的体恤”，因为官本头十年不起息，这不仅增强了官方将来勒索的可能，且尤为关键的是津沪线将永远存在官商两类股本，故实质上是官商合办；若按《变通》的上述规定，股商并没有多付出什么，却能以头等官报免费的方式将官本在数年后抵清，这不仅可弱化“官的体恤”，从而减少官方的勒索藉口，而更为关键的是，津沪线将来只存在商本，故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督商办。

《变通》进呈李鸿章后，李即按之奏定。^{[7]345} 郑之建言得到贯彻。津沪线的这一经办模式亦成为晚清后来官督商办电报运营的统一范式。还需补充的是，该线招股后，郑观应成为一大股东。^[15]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郑观应是津沪线建设极为重要的参与者。

(二)长江线、浙线建设的直接倡导者。津沪线开通后不久,郑观应即于1882年(光绪八年)3月初,禀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请求架设长江线。如果说李鸿章奏设津沪线是“为海防计”,那么,郑观应禀办长江线,则主要是“为商务计”。较早提出“商战”理论的郑观应认为,与同兵战讲求“兵贵神速”一样,商战亦讲求信息灵通。据此,郑指出:“窃自通商以来,泰西日富,中华日困,考其致胜之由,不外乎信息敏捷,转运神速,洋商猛著先鞭,华商瞠乎其後。”故若要改变华商这种不利的竞争态势,必须在中国的商贸发达之区架设电报,以利华商快速了解商情。郑进而指出,“长江自镇江溯达湖北,计一千五百余里,中间口岸甚多,而汉口一镇茶市尤为繁盛。水陆交冲,上通湘、蜀,议设电线,应为首要”;遂请求架设长江线,并拟迨长江线建成后再设浙线(由杭州经嘉兴、湖州、宁波至绍兴)。之所以欲设浙线,是由于“浙江系产丝之地,宁波、温州均为通商口岸,防务、商务并关紧要”^{[12]1006-1007}。且是时,该处商人已有迫切要求。郑说:“汉口茶市所聚,浙西丝斤所出,宁波亦徽茶口岸,三处商人,事关切己,商询情形,另禀请设线者接踵而至。”^{[12]1014}

但郑观应等的长江线请设并不顺利。因左宗棠并不愿郑等设造该线,而欲让其麾下洋务大员、巨商胡光墉独资承办,^{[16]52-53}故对郑的禀请迟迟不予批准。郑等了解此一内幕,见胡光墉一直未能开工兴建,为使申办成功,又通过故友、洋务局道员王之春之关系,面见了左宗棠,商议沿江设线事宜。但左以“电线有益于国、有害于商”之论搪塞,仍是不肯允准。郑的请办工作严重受阻,似陷入僵局。但郑等并未因此却步,一面为说服左宗棠而再致函王之春,指出:“文泥刺本南洋小岛而贸易忽兴,电报之设也。君士兰亦东部岛隅而文物忽盛,亦电报之功也”^{[12]1011}。让其转达左宗棠,以解左之搪塞论点;一面因左提出“咨商湖广督部堂、苏浙抚部院、湖北抚部院,飭询各商集议电线是否应行安设”,又向湖广、闽浙总督及鄂、豫、浙巡抚呈递《创设电线节略》,强调津沪线商董推广电线的专办权,指出:“津沪一线商报所入原知不敷开销,故禀定章程,早有众商出资报效,自应准其永远承办,推广施行之语,曾蒙批准在案。”^{[12]1013-1014}

局面的转机出自列强的觊觎。就在这时,一桩牵涉中国利权之重大电线设办事宜使本拟后设的浙线被率先提上议事日程。1882年11月间,英、法、美、德各使拟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准备敷设上海至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而达香港各口之海线。为此,英国署使臣格维纳(T.G. Grosvenor)援引1870年(同治九年)总署允准“英商可于中国沿海敷设海线”之成案,“其势几难禁遏”。中国之利权受到严重威胁。其时,李鸿章已闻电报股商已有架设浙线之计划,遂感到,倘中国能

先行架设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该处之海线获利必减,列强之请求或可作罢,即于1883年1月16日上奏清廷,拟劝集华商接办沪浙闽粤陆路电线,以杜外人觊觎。^{[17]33}两日后,清廷准奏。^{[18]198}这样,不但原拟后设的浙线提前获得批准,而且还被大大延伸为沪浙闽粤电线。郑观应亦随之受李鸿章之委,会办此线。^{[12]1505}

迟迟未得左宗棠准请的长江线亦遇同样情形。1883年7月5日,“有洋商议添水线由长江以达汉口”。此事为盛宣怀、王之春所阻。但左还是担心“洋人狡诈嗜利,未必遽作罢论”,遂于翌日正式向清廷奏设长江线。^{[19]2424-2425}22日得清廷允准。^{[18]316}31日,郑接到左札委,“襄办长江电报事务”。^{[12]1014}10月26日,左正式向清廷奏请郑观应等四人“会同盛宣怀专办长江设线事宜”。^{[7]785}至此,郑观应等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的长江线请设工作尘埃落定,而前此沪浙闽粤线已奉旨建造。综上所述,郑观应堪称该两线的直接倡办者。

三、电报经办模式的理念与现实

尽管中国大规模建设电报以后,各省因形势需要而也开办了一些官办电线,但主要线路基本是按津沪线模式而为官督商办。如前所述,官督商办方案提出之初,郑观应即对其基本内涵及运作方式提出异议,得到支持。但即便如此,郑仍不甚满意,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电报本应官办。对此,他曾说:“官应(即郑观应)溯于甲午年前,迭经条陈我公(指盛宣怀),谓轮船局宜归商办,电报局宜归官办。”^{[12]1028}

郑之所以有此理念与建言,是由于他认为,其一,从国际的惯例看,电报一般都由国家主办。在《易言》(36篇)与《易言》(20篇)中,郑皆以英国为例,称:其“电报设于王家”。^[482,209]1892年,郑观应著成《盛世危言》,其中《电报》一文更是说:“各国陆路电报皆设于国家”^{[14]665}。这是郑观应主张电报官办的前提。

其二,从中国的现行体制看,中国电报不宜商办。如前所揭,郑认为,中国既无宪法,又无商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商办,无法保证其长久不受官府的勒索。对此,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盖专制之国,政府动施压力,且现无商律;纵有商律,尚无宪法,犹恐政府不遂其私愿者。”^{[12]1024}正是有着这种担忧,电报官督商办提出之初,郑观应认为不应过多强调官的体恤,但即便是其基本内涵及运作方式其已按郑的意图作了重大修改,电报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排除官方勒索的可能。这是郑观应主张中国电报当为官办的关键。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郑对中国现行体制的不满,以及主张中国电报官办的无奈。

但甲午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改变了郑的这一看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第二款规定:

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地方之权并将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20]614}。6月2日，中日又立《交接台湾文据》，进一步明确了上述移交项目。^{[20]620-621}台湾所设陆路电线遂为日本侵夺。然日本并未满足于此，随后又欲侵占台湾至福建水线。但中国出示各种证据，证明该水线为商物，这才使得日本放弃直接侵占而改以赎买。^{[21]60-61}庚子之役期间，“德兵已占烟台电局，各国欲取上海电局，我以合众有股公司向各国争回，并能专设海线以达天津，行在南北梗塞仍可通电，毫无阻滞，机密绝无迟漏，改归官办，非有强兵力不能自守，则他人通消息而我不能通”^{[22]763}。这一切让郑感触颇深。郑说：电报官办之建议，“甲午年后，时势变迁，今非昔比，均谓似宜从缓。盖当此强邻环伺之秋，我国兵力不足以御侮，如归国有，动辄为外人要挟，万一中外交绥，必为外人所据，求如上年商业办法故智难矣。”^{[21]1028}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让郑不得不将官方勒索之顾虑暂放一边而力主电报商办。

但郑的这一认识转变不久即遭遇现实的打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0月，中国电报局督办盛宣怀开缺回沪“守制”。清廷在盛的反对者奏请下拟派张翼为电报局督办。盛与闻后遂求于时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以阻清廷此意。^{[23]1305-1306}袁趁机上的折将中国电报局奏归官办，^{[24]114}由此揭开长达六年之久的电报官办活动的序幕。同年12月12日，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将电报收归官办。不过，后因“筹款难足”，只得保留商股，但钦派电政大臣管辖，中国电报遂为商本官办。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1月6日，邮传部设立，电报官办活动加紧了步伐。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3月14日，会议政务处议定：电报赎归官办，每股给价一百七十元。^{[24]111}

正在澳门养病的郑观应闻知，立即表示反对。他要求股东联名公禀邮传部，准电报局遵照商律注册，永归商办，以维商业。^{[24]112}但时已迁邮传部右侍郎的盛宣怀致电郑表示，电报归官，势难中止。^{[24]1126}6月17日，邮传部正式奏请清廷，电报拟归官办。^{[25]1147-1154}郑阅此奏后，叹道：“昨读邮传部收赎电报商股奏折，义正词严，谁敢不遵？惟外侮日亟，各股东谓时势不宜”^{[21]1027-1028}，仍未改电报商办之初衷，但已感无可奈何。

邮传部深知郑在电报股商中的影响，认为若要众商服从，应先获是郑的支持，为此特电郑观应，“以开劝港商之事奉托”^{[21]1029}。邮传部此招，对向顾“国体”^{[21]1013}的郑来说，可谓击中其要害。此时的郑虽还是认为电报应归商办，即便国家收赎，也应订若干年为期，期满赎归国有，如此各股东方无异议，公私两便^{[26]113}，但已不能坚持，遂放弃为电报商办而做努力，转而争取政府给出合理的收赎价格，力保其在商人中的声誉与地位。

如前所述，邮传部初拟每股一百七十元，后在港沪股商的争取下有所上调，每股增至一百八十元。^{[14]442}香港电报局总办温佐才立即发出告示，认为“准加票价至一百八十元，自属格外优待”。要求各股东在三星期内到局挂号，以便报部兑换价银。^{[12]1033}

但广州电报股商林竹邻、许云涛、徐树堂等拒不兑股，提出政府“给还今年股息”的要求。郑虽接有部电开劝之谕，但从沪报了解到，电报股票实际的市价，为每股二百元，与部定一百八十元之价有较大差距，从而对林等的要求表示理解与支持，认为“若迫照交，显见抑勒”，并去信盛宣怀，让盛代乞邮传部尚书陈璧，要求满足商人意愿。^{[12]1027-1028}

但邮传部态度强硬，而此时多数电报股商已放弃其原本的要求。郑见此情形，感到难有作为，也就不再股价问题而努力了。是年8月3日郑致电邮传部表示：电报事关要政，现奏定赎归国有，势在必行，已无异议，并函劝广东、香港及澳门的各股东早到电局挂号。^{[12]1028-1029}

在这场电报归官活动中，郑先是坚持电报商办，不成后又退而求其次，坚持政府给以合理的收赎价格，结果也未能如愿。对此，郑观应作为电报股商公认的领袖，其内心是不安的。这可从郑在事后政府拟予之请奖时的态度得以察见。当邮传部尚书陈璧拟为郑请奖时，郑声明他在电股收赎中毫无劳迹而不受。^{[12]1029}不久，陈再以“本部拟俟事竣择尤嘉奖，并添电政议员以资整顿”相诱时，郑又坚拒。^{[12]1035}接着，温灏按陈璧指示，拟向邮传部转呈郑的履历以核奖，郑回话说，在此次电股收赎中，“股东吃亏，同顾国体”。自己系电报局创办董事，自愧不能固守原议，反邀奖叙，是增其过。^{[12]1034}话语的背后透出的是，郑作为一商人领袖，在与政府的关联中，一方面，他无法与之决裂，但另一方面，又有较强的矛盾冲突，其举措是何等的无奈。

四、余论

晚清的中国处于一急剧变化之时代，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一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矛盾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乃至发生严重冲突。其中，新旧思想间的矛盾、各势力派系间的矛盾、政府与商民间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转型中的晚清社会的一大特征。而具有洋务理论家、淮系干将、商人及早期维新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郑观应在晚清所从事的电报活动似乎处于上述各种矛盾与各类冲突的交汇点之上，从而较为集中地将其展示。

首先，郑观应初始作为一洋务理论家，其洋务思想与当时的保守思想发生严重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对于电报这一新兴西洋科技，郑观应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竭力向国人推介，并强烈呼请中国架设以满足社会之需求。但是时，中国的风气未开，大清不少人士对此表示反对，并予以坚决

抵制。这种反对与抵制,既有颠预愚昧的一面,更有思想守旧的渊源。故从根本上看,他们的矛盾与冲突反映出的是洋务派的新兴思想与保守派的守旧思想的矛盾与冲突。不过,郑观应的呼请还是得到越来越多朝野人士的认同与响应,从而逐步汇成洪流,最终冲破守旧的思想阵地,使得电报在中国建设起来,由此开启了晚清通讯的近代化之路。这又反映出,近代化是大势所趋,保守势力可以阻滞一时,不可遏制全势。

其次,作为淮系的一个重要干员,郑观应的长江线请设与湘系势力发生矛盾与冲突。郑观应稟请架设长江电线之时,遭遇两江总督左宗棠的百般阻挠。对此,郑后来回忆说:“与盛(宣怀)、王(之春)两公等拟设长江各处电线,初稟左相不许,旋托其左右,反复辩论,然后批准。”^{[12][1026]}从表面上看,左宗棠之态度似乎只关涉承办者之同,而其潜含着的却是湘淮两大派系间的分歧与矛盾。^{[16]52-53}作为湘系大员的左宗棠不愿看到电报这一新兴通信工具在中国的建设为淮系所包揽。于是,矛盾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郑观应等的请办尽管费尽周折,结果还是如愿以偿,这固然有着一系列偶然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是湘、淮两大派系在晚清后半期的此消彼长之态势。

第三,作为一商人,郑观应的电报建设实践与官方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津沪线招商承办后,郑观应成为其重要股东,但作为商人的郑观应,此时最担心的并不是电报的发展潜力,而是官方的勒索。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事实上,电报在晚清逐步推广期间,官方的勒索确是不断地发生。据统计,自1884—1902年,官方勒索的总额至少达到124万元,最高可能达到143.8万元。^{[27]279-280}其中影响较大者当是1899年军机大臣刚毅所提出的电局报效案。是年,大学士徐桐奏称,“电线布满二十一行省,获利不貲,盈余未曾归公,要求嗣后按年提存候拨。”^{[23]811}清廷遂让刚毅查办。刚最后订出:中国电报局捐洋十万元,除学堂捐外,另补缴二万元,并自该年起,每年加捐银四万两。^{[14]192}对此,郑观应愤而指出:“窃思政府不知恤商战以塞漏卮,只知勒商捐以济眉急。”^{[12][1024]}更有甚者,20世纪初年,清廷要求电报国有化。对此,郑观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电报“今办有成效,又归官办,无异农田甲就荒招工愚乙,有获甲夺回,则不论贤愚皆知曲直矣!”^{[12][1026]}并由此而奋起抗争,先是坚持商办,不成后又退而求其次,要求官方给以合理的收赎价格。但最终的结果是,商人不得不一再让步,最后只落得“当道不念创办之劳”^{[12][1026]}的无奈叹息,并称:“请旨飭遵,谁敢与争?”^{[12][1024]}这一切反映出的是商人与官方的矛盾与冲突,而冲突中,商人的表现又是何等的被动与懦弱。从根本上讲,这是缘于中国资本力量的弱小。

第四,作为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

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所思所想与社会现实进一步发生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当中国电报以官督商办模式在全国范围推广之时,郑观应却并非完全认同,而不断予以批评。这一方面是由于郑感到这一经营模式难以该企业能够按照规范的商业规则运作。郑观应曾愤然指出:官督之人,“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并对官方“荐人越俎代谋”等腐败现象提出尖锐批评,要求执行股东公举方式,“以符商律”。^{[12][1023-1024]}另一方面更是由于郑深刻认知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所处的严重不利的社会环境。郑曾尖锐指出:“盖专制之国,政府动施压力,且现无商律;纵有商律,尚无宪法,犹恐政府不遂其私愿者。”^{[12][1024]}在郑看来,改变这一切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正式基于这一认识,郑观应在晚清曾发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政治不改,实业万难兴盛”的强烈呼声。^{[12]11}这是一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时代呐喊,它也是郑区别于一大批在中国推行电报事业的洋务派官僚诸如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盛宣怀等的最根本之处。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直到清廷灭亡也未能建立起立宪政体来。这使得郑观应等不得不痛苦地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前行,也使得晚清电报不可避免地各种矛盾与冲突中艰难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沣奏(同治五年六月十九日)[A].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2[C]
- [2]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A].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4[C]
- [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六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4]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5]王之春.清朝柔远记[M].上海:中华书局,1989
- [6]王韬.设电线[A].弢园文录外编(卷三)[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丁·电线[M].台北:台湾艺印书馆,1957
- [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9]请设南北洋电报片(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A].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八[C]
- [10]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1]清实录(第53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7
- [12]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13]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14](香港)王尔敏,吴伦霓霞.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Z].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15]申报,1882-04-14

[16]夏东元.郑观应传(修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17]商局接办电线折(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A].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五[C]

[18]清实录(第54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7

[19]筹办沿江陆路电线片(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A].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六十一[C].台北县: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2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1]夏维奇.清季台湾电报发展述论[J].台湾研究,2005,(3):60-61

[22]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3]盛宣怀.愚斋存稿[M].台北县: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

[24]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Z].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

[25](清)邮传部.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M].台北县: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

[26]夏东元.郑观应文选[C].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02

[27](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M].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On Zheng Guan-ying'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elegraph construction

XIA Wei-qi

Abstract: Since 1870s, Zheng Guan-ying, an important foreign-affairs entrepreneur and reforming theorist,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values of the telegraph, a kind of important modern western communication tool, and its use prospects in China, and extens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telegraph construction in Late Qing since 1880s. The paper studies Zheng Guan-ying's main acti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telegraph construction in Late Qing, and emphatically probes into his main influences, and tries hard to bring to light some important features of Late Qing'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the modern times.

Keywords: Zheng Guan-ying; thought and practice; telegraph construction